

101	第一章 思想拐点	3
101	第一节 万亿的意义	3
101	第二节 回望 2003	9
101	第三节 新的发展观	17
101	第四节 转型中国	21
101	第五节 成人礼和 4 万亿	27
101	第六节 幸福、尊严、安全感	29
131	第二章 江西代价	35
131	第一节 难抑的冲动	35
131	第二节 鄱阳湖之殇	37
131	第三节 东江之惑	41
131	第四节 稀土之祸	44
131	第三章 鄱阳湖解题	49
131	第一节 新版图	49
131	第二节 实践的发展观	52
131	第三节 山江湖	57
131	第四节 还美鄱阳湖	62
131	第五节 “哥德巴赫猜想”	68
131	第六节 青山绿水	72
131	第七节 金山银山	77
131	第八节 鄱阳湖实践	82
131	第四章 战略新兴	91
131	第一节 国家转型	91
131	第二节 国家利器	95

转型中国的江西样本

第三节	美国制造	97
第四节	抢占先机	101
第五节	光伏头筹	104
第六节	新能源	107
第七节	中国“西雅图”	110
第八节	LED 照亮新经济	115
第九节	金属与非金属新材料	117
第十节	生物产业	120
第十一节	明天的经济	121

第五章 老区新政

第一节	赣南与赣北	127
第二节	红色记忆	128
第三节	历史欠账	131
第四节	国际案例	135
第五节	老区新事	138
第六节	国家调研	142
第七节	面对面	152
第八节	吹响铿锵号角	155

第六章 江西在哪

第一节	中部塌陷	159
第二节	麦当劳指数	161
第三节	合作崛起	164
第四节	泛珠“9+2”	166
第五节	江西海西	169
第六节	长江带	172

第七章 核心增长极

第一节	四个南昌	179
第二节	上任南昌	182
第三节	磁场效应	185
第四节	离心力	188
第五节	小城大事	190

第六节 从赣江时代到鄱阳湖时代	193
第七节 中三角——第四极	198
第八节 南昌模式——生态型工业化	200
第九节 低碳试点——第五个南昌	204
第八章 新建新城	
第一节 光明民生	211
第二节 一路之隔	215
第三节 助力增长极	218
第四节 生态答卷	224
第九章 洪马乐平	
第一节 洪马精神	229
第二节 对接鄱阳	230
第三节 绿色转型	233
第四节 江南菜乡	235
第十章 幸福民生	
第一节 民生无小事	241
第二节 民生大考	242
第三节 乐业	247
第四节 反贫困	250
第五节 缩小差距	253
第六节 赣州保障房模式	258
第十一章 走出去	
第一节 第一百个县	265
第二节 海外布局	269
第三节 海上丝路	272
第四节 与世界对话	277
后记:从头越	279

江西样本

第一章 思想拐点

2011年,江西GDP首次突破万亿元。

有着中国最后一湖清水——鄱阳湖的江西,人们不禁要问:万亿下的鄱阳湖还清吗?人们更要问:万亿之后的鄱阳湖还会清吗?

这样的提问,让人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今天,人们为什么更加关注发展的方式,更加关注环境敏感区域的发展动态?

一切的答案要回到2003年。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对于积贫积弱百多年的中国,忽然之间,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不是经济问题了,如何发展,如何更好地发展,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发展观,需要科学的解答。2003年,科学发展观诞生,成为中国新世纪指导发展的思想拐点。

江西的万亿元,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拐点处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直线,获得了微笑的曲线。



第一节 万亿的意义

2011年,江西跻身全国万亿俱乐部,虽然这样的速度落后广东十年,成为全国第23个进入万亿俱乐部的成员,但江西的进入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GDP突破万亿,对江西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江西经济实力的积累已经达到一个质变的临界点,经济发展正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这意味着全省财富积累将步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自江铜集团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突破1345亿元,成为江西首家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企业后,全省超千亿元的产业增至5个。

——这意味着在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即人均GDP方面,江西快速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据初步核算,2011年全省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2005年,江西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台阶,随后分别用了三年和两年依次跃上2000美元和3000美元台阶;而人均GDP从3000美元达到4000美元左右,江西仅用了一年时间。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4000美元是中等偏下收入阶段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分水岭”。经济学家分析说,人均GDP达4000美元左右,是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这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可以为百姓办更多实事。

江西经济强劲增长的奥秘在哪里?

2011年,尽管江西发展遭遇了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用电难、用工难、用地难、融资难等一系列难题,经受了春夏连旱、旱涝急转等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面对世界经济减速,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

但: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为江西省科学发展提供了明晰的“路线图”,为全省跨越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两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方案确

定的405个重大项目,有300多个已启动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近5000亿元。

据初步统计,2011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突破6600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全省水平;区内财政总收入849.6亿元,工业生产运行平稳,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力度不断加大,正成为江西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攀升。2011年,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增加值1568.3亿元,占全省工业的40.1%,增长21.6%,高于全省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江西省传统高耗能产业增速下降,仅前11个月,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低于全省1.1个百分点。

南昌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新余、上饶的光伏产业,鹰潭的铜精深加工产业,宜春的锂电子产业……如今,在科技创新基础上迅速成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前行。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效益与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7.8%提高到8.6%。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民间投资增长35.8%,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9%。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4.4%、44.9%,占全省出口的比重分别达37.7%、18.7%。财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达85.3%。

面对这样的发展速度,人们不禁要问,江西的环境保住了吗?鄱阳湖那湖清水保住了吗?

江西给出的答案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成为江西聚集发展要素的核心。目前,已有45个国家部委和央企与江西省签署了共同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合作协议。

生态经济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7%。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广泛推行,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生态旅游等服务业快速发展。

先行先试加快推进。启动了“五河”及东江源头生态补偿试点,6个城市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节能减排综合示范等国家重大改革试点,组建了鄱阳湖产业投资基金和新材料创业投资基金,林权交易走在全国前列。

在江西GDP突破万亿的同时,2011年江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万亿元,这是江西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苏荣解读“两个过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比GDP过万亿还重要,它与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相比,意义更加重大而深远。

2011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万亿元的省份有16个,其中,中部地区有5个。就全国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早是山东、江苏于2006年过万亿,紧随其后的是广东、河南、辽宁于2008年过万亿,河北、四川、浙江于2009年过万亿,安徽、湖北

于2010年过万亿。2010年过万亿的省份最多,共有6个,除江西外,还有湖南、内蒙古、广西、福建和陕西省。从表象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越万亿元的省份已不鲜见,但江西省却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有的投资大省一下感到江西很快上来了,积聚了较大的发展动能,又多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不可小视。国家统计局就因江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增量大,而多次调高江西省上报的GDP增速。再进行深层次比较分析,江西是在基数较小、基础薄弱、国家重大项目不多、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在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基础上,异军突起,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从2000多亿元向万亿元的跨越,殊为不易。

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投资能力的大小,经济弱省江西过万亿不同凡响。政府财力状况是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影响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江西省经济实力尤其是财力薄弱,但却实现了万亿元巨额投资,这与当年财力雄厚的省份投资过万亿元相比,更令人瞩目。山东当年过万亿元时,财政总收入4110亿元,是江西省的2.5倍;江苏3936亿元,是江西省的2.4倍;广东、河南、辽宁、浙江、河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内蒙古、陕西、福建等所有过万亿元的省份,当年财政总收入都高于江西省25.4%以上。广西2011年过万亿元时,虽然财政总收入比江西少6.6%,但投资总额却少了13.6%。这表明,江西省的投资所下的工夫更大,过万亿元确实不同凡响。

江西这几年投资高速增长,是在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宏观约束趋紧等复杂多变形势下实现了“弯道超车”,尤为不易。近5年来,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年均32.9%的高速增长,比全国同期平均增速高出7.3个百分点,居中部六省第2位。特别是2008年以来,江西已经连续4年增速居全国和中部地区前列。其中,2008年列全国第一位,2009—2011年均列中部地区前两位。投资总额从2000多亿到突破万亿,仅仅只用了5年时间,这在中部六省中只有江西和安徽。

2011年,江西省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万元,达到24865元,基本接近全国人均水平,居中部六省第一位,高出其他五省10%~30%,大约高出2000~7000元。人均水平高,说明江西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高的“含金量”,不仅对做大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促进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带来了更多实惠。2011年,全省民生工程投资达2700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5%。

民间投资多,发展活力更强。2011年,江西500万元以上民间投资达到6320.6亿元,比上年增长35.8%,高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1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2.2%,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87.8%,居中部地区第一。这主要得益于江西省不断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全民创业。这说明民间投资已成为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突破万亿元大关的主力军,也表明江西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强,发展充满活力。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是江西发展的两个需求。近几年来,江西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龙头,按照“核心是发展,特色是生态”的要求,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中加快发展,不断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在发展中严把项目准入关,对环境污染的项目,坚决不搞;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职工安全的项目,坚决不搞;黄、赌、毒、高危行业的项目,坚决不搞。重点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并围绕“绿色江西”品牌,大力推进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有效地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全省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60.05%上升到63.1%;“五河一湖”断面三类以上水质由2005年的76.3%上升到80.3%;11个设区市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生态环境质量居全国前列。实践证明,这几年江西省投资强劲增长,是在保护优良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殊为不易。

经济发展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江西经济欠发达,消费能力还不强,经济外向度还不高,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作为多年来乃至未来较长时期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过万亿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它意味着江西经济开始进入持续高增长的强势阶段,绿色崛起已临近“拐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从落后到先进,必然经历一个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阶段,时间约持续30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维持在35%~45%。江西省于2002年开始进入高固定资产投资率阶段,到2011年正好10个年头。在这10年间,江西固定资产投资率基本保持在45%~55%的高位,GDP年均增长12.8%。这充分说明,江西经济已经进入持续高增长的强势阶段,并还将延续20年左右,这20年将是江西未来实现跨越发展、进位赶超的黄金期。与此同时,2011年江西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3.2%,按照近几年来逐年提高的态势(2008年2.75%,2009年2.95%,2010年3.16%),预计2012年突破3.3%这一临界点已成定局。这标志着江西绿色崛起真正意义上的“拐点”即将来临。

它预示着江西产业发展开始加速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显著提升。历史经验表明,投资规模扩张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往往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近几年来,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江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加速成长,有力地提升了全省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投资强度和规模看,江西工业园区投资强度由2008年的47.05万元/亩提高到2011年的110.8万元/亩,增长135.5%;新批外资项目平均投资规模由2005年的412万美元提升到1040万美元,增长152%。从投资结构看,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2011年工业投资已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8.9%,其中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135.3亿元,比上年增长39%,高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近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2010年

达3 363.9亿元,增长29%,高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38.4%。按照这一发展态势,江西省产业发展将加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表明江西经济正在实现嬗变。它绝不仅仅是“小”向“大”量的扩张,更是“弱”向“强”质的飞跃,全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正在快速跃升,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变。

它表明了江西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大幅打开,发展后劲和能量将显著释放。跃上万亿台阶后,江西省的基数和规模已在做大,将呈几何级数增长,与几年前每年新增几百亿、千多亿的投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江西省一年的投资总额就相当于五年前的4~5倍,一年新增投资额相当于五年前一年的投资总额,如果增长20%,就是2 000亿元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连续多年的大规模、高强度投资,为江西省未来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积聚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先从基础设施看,江西省近五年在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共完成投资近5 500亿元,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10年,江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 672公里,列全国第9位、中部第3位,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速公路网;铁路在建里程1 200公里,通车运营里程2 735公里,铁路网密度居全国第12位;电力统调装机达到1 418万千瓦,近五年年均增长约10%。这都说明,江西省的发展条件明显改观,发展空间明显拓宽。再从产业发展看,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产业达到5个,其中有色行业突破4 000亿元;一大批投资强度高、支撑力强、后劲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和全省经济爆发式增长。

它提振了江西的发展自信,江西将以崭新的姿态阔步迈进科学发展的春天。有实力,才有自信。追求富强,是江西人几十年来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江西被誉为全国的“富农”。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纵向比,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横向与东部和中部多数省份比,由于区位等原因,经济发展显得不足。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江西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科学发展抓投资、抓项目,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择商选资”,从“打工赚钱”到自主创业,从人才流出省转变为人才流入省,广大干部群众在亲身感受全省的发展变化和在兄弟省份的注目中,提高了发展的自信心,增强了甩掉“老区就是贫困落后代名词”的决心和勇气。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GDP进入全国“万亿俱乐部”,必将加快改变江西省经济欠发达的状况,提升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竞争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江西发展的春天来了,江西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启动了。

2011年,江西省经济总量与2003年相比翻了两番;全省连续9年保持了12%以上的增长速度;2001年至2011年,全省GDP年均增长12.4%以上。2004年,江西经济总量在2000年2 003亿元的基础上,用4年突破3 000亿元;2007年又突破了5 000

亿元;两年后的2009年又突破7000亿元;2010年突破9000亿元;2011年突破1万亿元,达11583.8亿元,全省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绿色发展,让江西的探索更加艰难,让江西的选择更加谨慎。万亿元这一成绩仅仅是几年来江西交出来的成绩单,成绩的背后是江西如何解答这一发展难题的卓越工作。

链接

表 1-1 各省份进入“万亿俱乐部”的时间

年 份	省 份
2001 年	广东
2002 年	山东,江苏
2004 年	浙江
2005 年	河南,河北
2006 年	上海
2007 年	辽宁,四川
2008 年	北京,福建,湖南,湖北
2009 年	安徽
2010 年	陕西,内蒙古,黑龙江
2011 年	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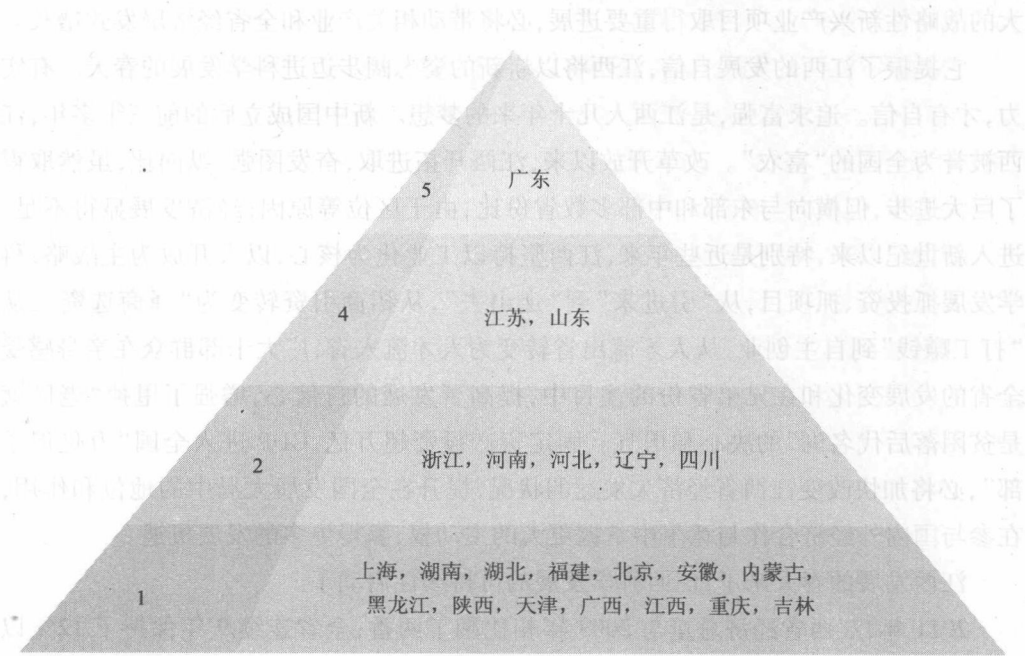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 GDP 超万亿省份金字塔(单位:万亿元)

第二节 回望 2003

福布斯集团总裁史提夫·福布斯曾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做“骑上了一辆自行车，最好不要有所停顿，否则就有倾覆的危险”。

史提夫·福布斯的这个比喻不但形象，也正好切合中国自行车王国的实际。

会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骑自行车的要领是保持一定的速度、掌握好平衡，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即是如此：关心速度大过关注其他问题，关注 GDP 的增长大过关心人的发展。

这样的发展还是一种原始的发展方式、单一的发展路径。

肇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全社会发展经济的热情。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经济跨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与高增长率相伴的是高通货膨胀率一度出现：CPI 由 1992 年的 5.4% 蹿升到 1994 年的 21.7%。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从 1993 年下半年起，我国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帖用了三年的治理整顿的药，真的治好了曾经令人揪心的通货膨胀的病。1996 年 CPI 下降为 6.1%，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但是，刚刚软着陆的中国经济却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1997 年 7 月首先在泰国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了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股市暴跌，汇率下降，生产停滞，经济出现负增长，泡沫经济破灭。

1998 年中国面临的是如何能够保持中国经济 8% 的增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与上一次“适度从紧”相反的政策，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的消费条件，拉动经济增长。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当年就增发国债 1 000 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 GDP 增长率 2.5 个百分点。尝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甜头，1999 年增发国债 1 100 亿元；2000 年、2001 年、2002 年，每年增发 1 500 亿元；2003 年，增发 1 400 亿元。6 年共累积发债 8 000 亿元，每年拉动 GDP 增长都在 1.5 个百分点以上。

但从 2003 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学界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质疑，将这个政策比喻为某种程度的“吃鸦片”，虽然效应明显，却产生对积极财

政政策的依赖,而这种过分的依赖会造成国家债务负担过重。

200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次提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警告。到 2004 年,这种声音成为中国经济界压倒一切的舆论。

为什么在 GDP 增长达到 9.1% 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舆论? 在这样一个良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央政府提出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担心的又是什么?

2003 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经济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改变了改革开放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发展路径,人们开始深刻思考成绩背后的隐忧。

2003 年的春天,过去判断已经得到缓解的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形势更加紧张。更为重要的是,一场突发事件警醒、启迪和推动了中国观念上的大变革。

2003 年 2 月 8 日,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一个未经证实、公众也不可能证实的小道消息在广州市民中间流传——广州出现了一种传染性肺炎。

这就是“非典”。到 8 月 16 日,最后两位“非典”病人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卫生部统计,全国共有 2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内地累计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 5 327 例,治愈出院 4 959 例,死亡 349 例,病死率为 6.55%。

“非典”爆发后,全球陆续有 120 多个国家对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世界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新兴经济体,此时,成为世界避犹不及的地方。

深层次的问题暴露了出来:“非典”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注意社会的协调发展,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的煤荒、电荒、油荒拉响了资源短缺的警报;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重压……这一切的发生是在中国加入 WTO,进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时候;是在中国实现了人均 GDP 1 000 美元,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重化工业阶段的时候,令人担心的是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发展阶段后,如果不解决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客观上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里。

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比较 2003 年的情况,改革开放前 25 年的政策选择是相对简单的,不是治理通货膨胀就是治理通货紧缩,虽然用力的方向可能是反向的,但大多数的时间里,一帖药也能治好病。然而,进入之后所处的这个外部困境与内部困境交织的复杂的发展时代,不要说一帖药能治好病,可能几帖药都难于治好一种病。

人们担心,1 000 美元陷阱的规律是否也会左右中国发展。

2004 年“两会”刚过,温州炒楼团北上的消息惊动了北京。此前一年人们就已开

始注意温州炒楼团这一现象,到现在,温州的炒楼团已经从南到北席卷了中国的上海、南京、杭州、大连、三亚、伊犁、满洲里等数十座大中小城市,有的甚至已经涉足东南亚等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仅温州一地的游资就超过了千亿元。

2003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这届政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警告:目前快速发展的中国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现象。此前,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和新华在线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房地产的区域性泡沫现象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广东和浙江最为突出,但是,一向平静的重庆、成都、西安也出现了泡沫现象。

其实,温州炒楼团的是是非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炒楼背后经济发展道路的迷失。

温州房地产的投机行为,让人回想起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刚刚摆脱石油危机影响的日本,房地产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大量的游资不仅大幅提升了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也将这一现象扩张到全世界。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数据,1980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00,1985年为120.1,1988年暴涨到了334.2。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1991年,连续疯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终于支持不住了。应声下落的日本房地产价格,推倒了股市,推倒了一直追逐房地产的日本金融信贷,推倒了几乎所有投资于日本房地产经营的企业,也推倒了日本的经济。

正当日本人在世界各地大肆炒卖房地产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却发现了硅谷。

在《第三次浪潮》出版之后,国内翻译出版了《硅谷热》。这本大量采集自硅谷地方媒体的小册子记录了硅谷的孩子们是如何成长的,也让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硅谷。

1976年,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这些今日富豪榜上的人物,这些今日带动和影响全球产业发展方向和人们生活与行为方式的人物,聚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到圣何塞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地带,开始了他们以计算机技术带动起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日后全球产业界关注的人物,除了优秀的个人素质之外,美国政策的调整使他们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1969年,美国国会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8%增加到了49%,这次抽血使风险投资的资金量从1.71亿美元锐减到了1975年的1000万美元。1978年,在硅谷和其他地方的高技术公司的活动下,美国国会重新将长期资本收益的税率降到了28%,1981年又一次降到了20%,到1982年,新的私人风险投资的资本达到了14亿美元。

虽然,日本通产省也很快将计算机技术作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但这一次,美国的企业家们吸取了汽车工业曾经输掉市场的教训,将核心技术和标准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硅谷热》记载了这样一个巧合:1981年的时候,当大量的日本旅游者揣满升值日元到硅谷旅游的时候,这里还出版了一张日文的硅谷地区的导游图。

硅谷的发展早已被人注意,硅谷这个名字也早在1971年就叫响了。但是,真正总结这种经济模式,将这种新模式命名为“新经济”的,是1996年底的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项国策。

这一次的命名真正发酵了日本旅游者在硅谷的所见所闻。2000年,在经济连续衰退了10年之久以后,日本政府看到了新经济的活力,希望能够搭上信息技术这班车。但是,同年突如其来的互联网泡沫一下子打碎了日本经济复苏的梦。

2000年美国出现了网络泡沫,大批的互联网公司倒闭,风险投资有去无回,但是,新经济并不等于互联网,网络泡沫并不等于新经济泡沫。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还带动了生物技术等多种产业的兴起,网络泡沫之后,美国的生物公司迅速崛起,虽然到目前还没有填补网络经济的损失,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让人们感受到新经济的活力。

在信息产业领域美国人一直提防着日本人,加之,美国新经济的发动机来自民间,经济驱动力更加强劲,而日本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这就使美国走在新经济的前面。依靠经济飞速发展期的积累,日本人拱起了一个带来十几年衰退的房地产经济泡沫;而美国人则成功转型,创新了一个新经济模式。

两种道路,两样结局,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和经验,走出适合自身境况的发展道路?

从先发国家的先发历史经验中,人们发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韩国,1977年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随后进入全速发展期,在1977年到1995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飞跃;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一规律被称为1000美元陷阱,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到底“1000美元陷阱”会带来怎样的不良结果?

当时,有学者举巴西为例。一是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占总人口的比例长期徘徊在10%~15%左右;而且完全依附在特权集团之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技术和资本力量。二是多数人长期不能进入现代化进程,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并长期固化。例如,巴西1%的人口占有了50%的财富,而3%的人口占有着2/3的土地,多数人被挤出了现代化进程。

简单说,这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是一种少数人幸福多数人陷入贫困的现代化。而在2002年底,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带领他的课题组完成的关于当

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发现,占中国总人口 80% 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经济过热、社会矛盾交织的 2003 年告诉人们,诸多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人均 GDP 1 000 美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在它之后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可能会是一个矛盾凸显的时期。选择是无可回避的。

2003 年 10 月,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宝马车撞人案件。该案判决并经媒体公布后,一些媒体、网民和群众提出质疑。最终质疑演变成了贫与富、官与民之间矛盾的一场讨论。据说,对宝马案相关新闻的网络监测发现,浏览这个消息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当年人们对“非典”的关注度。

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会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什么现在有一种倾向,动不动就将罪恶和财富画等号,将财富与权势画等号?

宝马案让我们看到,公众关心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中的这个人是个富人,这个富人可能依靠权势逃避法律的惩处。这反映出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贫与富对立、公众与权势对立的情绪。

能够说明产生这种情绪原因的,是 2004 年 2 月 25 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 1995 年的 2.8 提高到 2002 年的 3.1。

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没有。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民没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他们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五倍,甚至是六倍。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 1954 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了一个倒 U 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收入分配的差距与人均国民收入高低相关,大体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逐步扩大后有一段稳定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形成一条倒 U 曲线。根据倒 U 型理论假说,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非农人口所占比重达 60% ~ 70% 的时候,收入分配达到 U 型曲线的拐点,此后收入差距将会呈逐步缩小的趋势。倒 U 型理论是个假说,可是人们往往拿它来对位国家的发展。如果拿它来和中国的现实对位,我们正处于这个拐点。

此前,收入差距扩大、失业情况加重、社会保障不完善还仅仅是不利于提振内需的主要原因,但到了 2003 年前后,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课题组的一组数据显示,

2002年底,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1 000万人,而同期全国城镇从业人员数量为23 940万人,参保人数还不足目标人口的半数。同期参加医疗保险的总人数约9 000万人,医疗保险目标人群除城镇从业人员外,还要包括近4 000万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差距更大。

再看一组农村医疗状况的数据: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合作医疗覆盖面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虽然1997年1月中央提出“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但全国只有18%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只覆盖了全国农村人口的10%。目前,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着2/3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85%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在当时,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注意而任其发展下去,显然会阻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尽管这些矛盾的生成有其历史的原因,不必以今天的认识过于苛责往昔的疏失,而严酷的现实终归是不能不严肃面对的。

“十六大”要求,我们应努力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不超越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规律无由摆脱。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中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拉美化的可能性同时并存。

2003年前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也在增强,压力加大。

2003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在多个场合和媒体上发表了他们对部分行业过热情况的担忧。

以汽车行业为例。近年来中国各地已有数千亿元投资于汽车产业,2003年共有123家整车生产厂,遍布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产量超过50万辆的只有两家,超过10万辆的只有8家。而从国际汽车产业发展现状看,年产量100万辆以下的汽车公司已经不具规模优势,200万辆规模的也面临重组的局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能力扩张存在巨大的风险,一部分企业必然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并导致银行坏账增加、工人失业、企业破产的严重后果。

同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对产能过剩、总量失衡、投资过热的电解铝行业的状况提出了批评,要求各地停止审批任何形式的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更不得化整为零变相上新项目。对外商投资项目也提出,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到2003年底,中国已形成电解铝产能510万吨,当年实际产量435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国。可怕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国,而是当时国内在建和拟开工建设的电解铝规模近400万吨,接近了当年电解铝的生产能力。

紧接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对在一年内投资增长了96.6%的钢铁行业提